

腐败的经济学研究述评

○李名峰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日益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腐败的成因、腐败的测量、腐败的危害和腐败和反腐败的对策等四方面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评,并指出现有腐败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腐败 反腐败 经济学

一、腐败的成因

1、社会转型论。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产生腐败的原因有三:第一,现代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传统准则可以接受而且合法合理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的行为;第二,现代化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掌握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力图在政治领域中产生影响的尝试引发了腐败;第三,现代化要求政治体系强化管制,强化管制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一些国内学者亦引用亨廷顿的社会转型论来解释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社会转型论的提出植根于亨廷顿对英美社会发展史的深刻理解和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均与英美有很大差异,国内学者不加选择照搬社会转型论来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显得有些牵强。

2、权力寻租论。寻租理论源于塔洛克(1967)对为追逐垄断租金而导致的资源耗费的研究,安·克鲁格(1974)正式提出“寻租”概念,并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严格规范分析,之后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赋予公共机构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过对“政治市场”中对租金的供求双方的角逐行为分析,认为寻租是人们(寻租者)凭借公共机构(供租者)准许的特权取得垄断地位以获取垄断租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活动。我国有很多学者喜欢将腐败与寻租等同起来,实际上腐败与寻租存在以下区别:并非所有寻租行为都是腐败行为(如游说活动不属腐败);腐败者皆为掌权者,而寻租者中掌权者、有钱者、有关系者兼有之;寻租的目标仅在于租金,而腐败的目标则广泛得多,除租金外还有权力、名位、女色等非货币性对象;腐败皆为非法,而寻租则合法与非法兼而有之。

3、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贝克尔(1968)提出只有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它资源用于其它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实施犯罪行为。其后,贝克尔和斯蒂格勒(1974)进一步分析了代理人在决定是否渎职时会考虑渎职被查处的概率,比较渎职带来的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同时也分析委托人执法的收益与成本。贝克尔认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是不可能根除腐败或者彻底抗拒腐败的诱惑。而提高代理人的职位薪酬可以制止渎职,这一观点后来成为“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

4、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艾克曼(1975,1978)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把“腐败”定义为代理人接受的非法的第三方的支付的行为。由于现代民主政治实行代议制,公众作为委托人,国会代表和行政官员作为代理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而且信息不对称。因此代理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去谋求私人利益。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的腐败是至少三方中的各个主动或被动涉及的当事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的博弈结构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寻租理论仅讨论了垄断租金供求双方的行为关系,可以被腐败的博弈结构所包含。与寻租理论相比,委托—代理模型更能揭示腐败的问题本质。近三十年来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与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交叠融合,逐渐成为主流的腐败经济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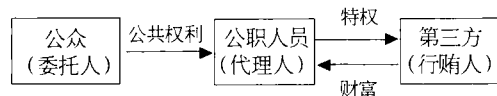


图 1 博弈结构

二、腐败的测量

1、主观测量法。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在国际影响最大的主观腐败测量指标是国际透明组织编制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CPI 的数据样本,是根据“问卷调查”资料编制。调查的对象是所选定的商界人士、风险分析师和一般民众针对贪污腐败的情况的个人经验与感受。CPI 按最腐败的 0 级到最不腐败的 10 级排列。CPI 的不足在于编制时未考虑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且调查对象限于西方社会人士,其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而指数排名涉及的腐败范围更是只限于国际商务活动中各国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对诸如:裙带关系、挥霍公款、参与走私、虚报浮夸等腐败行为的考察。因此该指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他主观腐败测量指标还有: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Control of Corruption, CC),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标(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CR)等。

2、客观测量法。指通过统计分析实地调研数据以及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造成的损失。由于现实中被曝光的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的成果,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客观测量法包括:对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汇总。我国反腐败数据的统计和披露还很不全面、很

不规范,不能真实反映我国腐败的真实程度。根据租金规模估算腐败损失。美国经济学家安·克鲁格(1974)根据公开的经济统计数据用一个模型估算了当时世界上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的租金总额。其后,我国不少学者仿效克鲁格的做法,估算了不同时期我国的租金总额。据估算2004年我国全部租金46787.0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为29.3%,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但是,寻租行为并不一定都是腐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价格比较法估算。迪·泰拉等发现在1996—1997年实施的打击腐败工作的前9个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公立医院取得基本同类物资所支付的价格下降了15%,该比例可看作这一时期该市医院采购中腐败状况的下限。价格比较法为我国学者测量腐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三、腐败的后果

1、有关“腐败有利”的论点。莱夫(1964)认为:私人贿赂相当于向政府官员提供了一种计件工资,可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作为对低工资的一种补偿,腐败可以将政府官员的利益与私人企业的经营联系起来,促使政府关注和支持经济活动。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适度腐败有利论”。张维迎(1995)提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上述腐败有利论的观点被看作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代言,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笔者看来,腐败可以分为很多种,张维迎主要是从“偷窃型腐败”的角度解读“腐败有利论”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腐败是否有利受到行贿成本、官员主动创租、腐败契约的保障和负外部性等因素的制约。

2、腐败的危害。从国内外研究来看,经济学主流观点对于基于次优理论的“腐败有利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腐败的危害包括:第一,降低投资率,阻碍经济发展。莫罗(1995)从实证角度发现,腐败与投资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即腐败会降低投资率。第二,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产生负面影响。坦茨(1997)的系统性研究发现,较高程度的腐败会导致财政预算中较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理由是公共投资项目能够为相应的腐败官员提供受贿机会。第三,腐败浪费大量社会资源。腐败中的寻租活动创造垄断,降低市场均衡水平,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即所谓哈伯格三角)。第四,腐败导致强大的利益集团产生,妨碍经济转型和制度向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迁。张维迎(2006)认为现在政府官员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深化的阻力。第五,腐败导致政权软化,政府权威受损。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问题时提出了软政权的概念,在他看来,腐败从根本上讲不过是软政权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第六,对贫困人口和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古普塔等人(1998)利用1980—1997年间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腐败使税收制度杀贫济富,腐败剥夺或减少穷人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腐败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越严重。

四、反腐败的对策

1、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铲除权力寻租的基础。约翰逊(1998)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官员的管制权越大,企业的负担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转入地下经济的动机则越强烈。虽然为了遏制腐败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盲目

推进经济的自由化也可能带来更严重的腐败,例如:在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方面)进程中,将大量公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公共权力就会创造大量的腐败机会。

2、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激励。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高薪可以同时满足政府官员的参与约束(即公务员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和激励相容约束(即政府官员不从事腐败活动的收入高于从事腐败活动的收入),从而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然而,高薪养廉政策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公务员的高薪政策本质上是以增加税收的形式将非法的贿赂转化成合法的公务员报酬,增加了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一政策本身可能会导致新的腐败。因为高薪必然会激励众多人员使用包括行贿在内的各种办法挤进公务员队伍。此外,对于一些已经习惯于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而言,高薪未必能减少腐败。

3、引入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苏珊·罗斯·艾克曼提出的“重叠行政原理”,主张引入政府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以降低官员与行贿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像发放许可证等没有计划限制的项目,可以通过增加授权机构。如果被一个官员拒绝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官员,因此官员们就不可能榨取大量的贿赂。对于有可能增加企业支出的部门如警察部门,可以分派给打击非法生意的警察以相互重叠的执法区域。但是重叠行政会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公共支出增加,势必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腐败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腐败经济学研究则相对比较年轻。在腐败形成机制方面,现有模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均是微观模型;其二,不能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建立腐败内生化的可检验宏观经济模型将是未来腐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在分析腐败对某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时几乎都假定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保持不变,这一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近十几年来腐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由侧重腐败的微观形成机制研究转向侧重腐败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二是由侧重腐败的规范研究转向侧重腐败的实证研究。因此,腐败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将成为腐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腐败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解。另外,腐败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腐败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是大势所趋,将腐败问题的研究上升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腐败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J].中国改革,2002(5).
-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46000亿:新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J].新青年·权衡,2006(11).
- [3]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N].经济观察报,2006-3-13.
- [4]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 [5] Gupta, S., Davoodi, H. & Alonson - Terme, R.: 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equality and poverty[D].IMF Working Paper, 1998.
- [6] Johnson, S., Kaufmann, D., Zoido - Lobaton, P.: Regulatory discretion and the unofficial economy[D].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Vol. 88).
- [7] 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的政治经济学[A].金伯利·A.艾略特.腐败与全球经济[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